

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名世,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。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1920年代末开始执教清华,全面抗战爆发后又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,与这三所大学有着极深的渊源。

冯友兰晚年所居寓所曰三松堂,以庭中三棵松树而得名。1980年代初,先生以86岁高龄完成了《三松堂自序》一书,“忆往思,述旧闻,怀古人,望来者”,对自己一生做了总结与回顾,其中对北大、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回忆更是令人动容——在先生去世30周年之际,写下这些琐碎的文字作为纪念。

### 北大哲学求知路

冯友兰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官绅之家,父亲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做官。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,冯友兰先后在开封、武昌和上海读书,1915年中国公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。

冯友兰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就对逻辑产生了浓厚兴趣,他决心要学习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,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有文科哲学门(哲学系),所以冯友兰就报考了北大。报考北大文科的考生不多,因为当时文科毕业出路太窄,顶多混个“教育名流”。北大负责报名的职员劝冯友兰报考法科,如果以后想读文科,可以申请改科。冯友兰听了他的话,但入学后还是申请改了文科。

1915年9月初,冯友兰到北大参加开学典礼。典礼由校长胡仁源主持,据冯友兰回忆,校长讲了几句话后,突然有个拖着辫子的教授站起来发言,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。也不知这是预先安排好的,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,反正说了很多,主要是骂人,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物。辜鸿铭骂完以后,也没人再发言,于是就散会了。

辜鸿铭是北大有名的怪人,民国建立好几年了,还拖着个大辫子。但辜鸿铭热衷向西方介绍和宣传东方文化,在国外影响很大,当时西方流行一句话:“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,但不可不看辜鸿铭。”

北京大学还有个怪人可与辜鸿铭媲美,此人就是黄侃。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嫡传弟子,学术深得其师三昧,禀性也如其师,嬉笑怒骂,恃才傲物,任性而为,人称“黄疯子”。在北大校园里,黄侃很受学生欢迎,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说:“他上课的时候,听讲的人最多,他在课堂上讲《文选》和《文心雕龙》,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。”黄侃善于吟诵诗章,抑扬顿挫,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,学生们也情不自禁地地随着他唱和。黄侃与学生之间的忘我唱和,后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的流行文化,被师生们称为“黄调”——据说当时“凡有学生处,皆闻黄调声”。

冯友兰放假回家后,也学黄侃的样子念诗念文章,引起了妹妹冯沅君的兴趣。冯友兰于是按照黄侃的套路,选了些诗文教给冯沅君,妹妹非常聪明,不但会讲会念,还学会了写作,居然能写出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。后来在母亲支持下,冯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,走上了文学研究和创作之路。新中国成立后,冯沅君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,与夫君陆侃如同为国内知名学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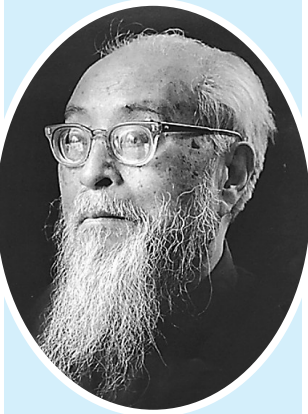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哲学分为中国哲学门、印度哲学门和西洋哲学门,但实际上印度哲学门和西洋哲学门根本没人教。给冯友兰这帮学生讲授中国哲学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开始讲起,讲了半年多才讲到周公。



西南联大旧址

# 冯友兰与三所名校的渊源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冯友兰先生

1916年底,蔡元培到北大担任校长,他主张教育独立,秉持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理念,聘请了包括胡适、梁漱溟在内的一大批文化名流到校任教。胡适和梁漱溟对冯友兰影响颇深,也让他明白了在新天地之外,还有更新的天地。特别是胡适,讲述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和孔子讲起,将三皇五帝直接砍掉,这对于冯友兰来说是个质的飞跃,面目为之一新,精神也为之一振。

大学毕业后,冯友兰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,师从哲学大师杜威,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和思考。

### 清华园的“太乙真人”

冯友兰与清华大学颇有渊源,他在开封中州公学中学部就读时,清华学校正式招收学生,许多朋友都劝他报名应考。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,以后是要出国留学的,母亲舍不得他远涉重洋,坚决不同意报考。冯友兰虽然错过了到清华读书的机会,十几年后却以教授身份走进了清华园。

冯友兰到清华不久就担任了哲学系主任,后来又当了文学院院长,一生很长时间都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。据冯友兰的学生回忆,冯先生长髯飘胸,处事豁达,有仙风道骨之气。当时他住在清华乙所,学生就将这里叫作“太乙洞天”,而冯先生就是“太乙真人”了。

冯友兰和学生们关系密切,感情很深。1930年代学潮越来越多,影响也越来越大,国民党情治机关常到学校跟踪、监控、逮捕进步学生,冯先生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这样写道:“国民党军警特务所要迫害的学生,如果他们信得过我,就到我家隐蔽,我尽力掩护,不管认识不认识,也从不问他们的姓名。”1936年的一天,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,要逮捕学生,校长梅贻琦让冯友兰等人去他家开会。正在这时,两个学生跑了进来躲藏,冯夫人将他们让进了客厅。

到梅家后,梅贻琦让参会的各院院长不要离开,以便随时应付情况,然后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秦德纯,让他出面协调。秦德纯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心腹,他亲自去找宋哲元求情,事情顺利解决,军警撤出了清华园。

等冯友兰回家,屋里静悄悄的,那两个学生早就离开了。妻子告诉他,学生坐在客厅沙发里睡觉,鼾声如雷,她怕外面有人听到,就把他们藏在后厨厨房里。冯友兰一直不知道两名学生是谁,多年以后在一个会议上遇到姚依林,他向冯友兰提起此事,说其中一人就是他。

在清华教书期间,冯友兰完成了著名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全书分上下两册,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。据冯友兰回忆,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出版时,学校将其列为“清华大学丛书”,并请陈寅恪和金岳霖两先生审查。陈寅恪与金岳霖对这部著作评价颇高,并不

约而同地将《中国哲学史》与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相提并论,这是对冯友兰的高度认可和肯定。

### 联大矛盾调和人

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平津战局恶化,“国民政府”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,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之所以选择长沙作为临时大学校址,是因为早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,清华大学就在岳麓山下修建了一整套校舍,预计1938年初即可完全交付使用。与此同时,学校急需的一些图书、仪器也陆续运抵长沙。

但好景不长,随着局势恶化,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昆明,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西南联大在云南待了整整8年,直到1946年秋才返回平津复校。联大成立之初,因文学院院长胡适未到校,文学院院长一职由冯友兰代理;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,文学院院长由冯正式接任;期间冯友兰数次因事请假,院长一职分别由杨振声、汤用彤和雷海宗暂时代理。

冯友兰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,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,三校的哲学系、心理学系和教育学系合并组成了临大哲学心理教育学系,系内分设哲学、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组。学校迁昆明后,教育学组划归联大师范学院,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称哲学心理学系,分哲学和心理学两组。期初本系教授会主席一职由冯友兰担任,后因冯代理文学院院长,教授会主席改由汤用彤、冯文潜和贺麟先后担任。

抗战胜利后,西南联大民主运动风起云涌,富于爱国传统的联大学生站出来呼吁和平,反对内战。1945年11月25日,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驻昆高校6000余名师生联合召开时事晚会,但遭到当局阻挠和恐吓,师生们以罢课抗议,却遭到更为严酷的镇压。12月1日,冯友兰正在家里休息,突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传出手榴弹爆炸的声音,看见吴晗匆匆跑出来喊:“开火了!杀人了!学校赶紧想办法。”这就是震惊全国的“一二·一”惨案,于再、潘琰、李鲁连和张华昌等4人牺牲,10余人受重伤。

惨案发生后,昆明全市学校罢课抗议,要求严惩昆明警备总司令关麟征。冯友兰在这次运动中充当了调和人角色,他先让学生复课,然后又让当局将关麟征去职。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这样写道:“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,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……可是进步方面的人,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。我觉得很灰心,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,本来想照顾两面,可是两面都不满意。”

正在这时,有西方朋友邀请冯友兰到美国翻译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一书,冯友兰于1946年9月去了美国,而联大也在此前后复员北归了。■